



Zhong Guo



近现代媒介技术演进 与文化传播途径研究



许立勇 于翠玲 等著

红旗出版社

中

國

Zhong Guo



近现代媒介技术演进 与文化传播途径研究



许立勇 于翠玲 等著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现代媒介技术演进与文化传播途径研究 / 许立勇等著.

—北京: 红旗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051-3552-9

I. ①中… II. ①许… III. ①传播媒介—研究—中国—近现代 IV. ①G219.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9861 号

书 名	中国近现代媒介技术演进与文化传播途径研究		
著 者	许立勇 于翠玲 等		
出 品 人	高海浩	责任编辑	赵智熙 周艳玲
总 监 制	徐永新	封面设计	王 哲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727	编 辑 部	010-64071348
E-mail	hongqi1608@126.com		
发 行 部	010-64024637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51-3552-9	定 价	50.00 元	

欢迎品牌畅销图书项目合作 联系电话: 010-84026619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绪 论 媒介技术视域下的文化传播·····	001
第一节 媒介技术在学界的关注度提升·····	002
第二节 媒介技术的演进对文化传播的塑造·····	005
第三节 中国近现代文化传播形态中的媒介技术演进·····	007
第一章 印刷术媒介·····	013
第一节 西方印刷术的传入·····	013
第二节 印刷术的传播业态·····	022
第三节 印刷媒介的传播效应·····	027
第二章 摄影术媒介·····	039
第一节 摄影图片出版物兴起的技术支撑·····	039
第二节 摄影图片出版物的类型·····	045
第三节 摄影图片出版物的传播效应·····	057
第三章 电报媒介·····	063
第一节 电报媒介技术的传入·····	063
第二节 电报媒介的传播业态·····	077
第三节 电报媒介的传播效应·····	086
第四章 电话媒介·····	094
第一节 电话媒介的传入·····	096

第二节	电话媒介的传播业态·····	100
第三节	电话媒介的传播效应·····	109
第五章	唱片媒介·····	120
第一节	唱片传入中国·····	120
第二节	唱片的发展业态·····	129
第三节	近现代唱片的传播影响·····	135
第六章	广播媒介·····	138
第一节	无线电的出现与传入中国·····	138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广播电台业态·····	141
第三节	广播的社会功能·····	146
第七章	电影媒介·····	158
第一节	电影技术的发明、传入与发展·····	158
第二节	电影产业发展·····	167
第三节	电影技术的发展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173
第八章	电视媒介·····	179
第一节	民国期刊中的电视媒介·····	179
第二节	国内外电视业的发展·····	186
第三节	电视的社会功能·····	191
第九章	中国近现代媒介技术演进与文化传播发展的规律·····	198
第一节	近现代新媒体与文化的空间存在·····	198
第二节	文化对空间的争夺·····	204
第三节	从时空观念的角度看媒介技术演进·····	208
后 记 ·····		211

绪 论

媒介技术视域下的文化传播

传播是文化的基本属性，一切文化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生成和发展的，而媒介是文化传播不可或缺的中介和载体。文化、传播和媒介是人类文明史上紧密相连的三大要素。迄今为止，人类的文化传播历经了四大主要媒介时代，分别是口语媒介时代、文字媒介时代、印刷媒介时代和电子媒介时代。自印刷时代，科学技术开始向媒介渗透，媒介时代的跨越以及各个时代内部媒介的演变都深深打上了技术的烙印。自印刷时代，社会文化迎来了一系列深刻而广泛的变革：继文字之后，声音、图片、动态影像都有了记录和传播的载体，信息的流通速度大为提升，信息的复制和传递变得轻而易举，文化的表现形式由此大大丰富，文化的传播方式从人际传播走向多样化的大众传播，大众文化、影像文化等新的文化业态产生并逐步繁荣。这些变革，离不开西方印刷术、电报、电话、留声机、广播、电影等媒介技术的推动，西方机械印刷术让文字的复制变得愈加便捷，电报实现了文字传播速度跨越式提升，电话实现了声音的即时传播，留声机、广播和电影为声音和图像的记录和传输提供中介。这些媒介技术大多诞生或成熟于近现代，例如，西方机械印刷术以15世纪中期古腾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为基础并成熟于19世纪末，电报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电话发明于19世纪中后期，留声机于1877年由爱迪生发明，真正的无线电广播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电影技术产生于19世纪末。可以说，在这场变革中，近现代科学技术的渗透无处不在，每个阶段的机器和技术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人类悠久绵长的文化历史中,文化传播所使用的工具和媒介一直都在发生改变,但是在口语和文字时代,文化传播的方式和途径的变化都相当缓慢。而到了近现代,伴随着西方印刷术的革新以及电子媒介的快速更新,传播技术的演变呈现出井喷的态势,导致文化传播方式的急速变迁,给人类文化传播带来了深刻影响。在新技术的荡涤之下,一幅波澜壮阔的文化传播变迁史图徐徐展开,引导人们开始从技术的视域重新审视中国近现代文化传播的进程。

第一节 媒介技术在学界的关注度提升

在文化研究领域,以往的学术研究重点一直都是以文化内容、传播者、受众、传播环境、效果影响等为主;在对传播媒介的研究上,人们早期的主要关注点也是落在内容、传者、受众、效果等方面。围绕着这些方面,学者们进行了大量深刻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法兰克福学派从批判的角度对文化工业的研究、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拉扎斯菲尔德的大众媒介有限效果论、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文化理论等,传播媒介本身的重要性反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被忽视的状态。

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传播技术领域迎来了一波接一波的迅速革新,电报、电话、留声机、轮转印刷机、电影、广播、电视等新技术接踵而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刷新着文化的传播方式。和这些新技术伴随相生的,除了信息流通方式的变革,还有大量看不见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和挑战。例如,电报技术的诞生,不仅使远距离的信息传递更加快捷,还产生了新的工商业惯例、新的社会关系、新的外交方式和战争方式、新的地缘政治;同时电报还对新闻的定义产生了影响;从更大范围上来说,电报还促进了人类时空观念的改变^①。技术的革新刺激了各种媒介研究,促使学者跳出固有的媒介内容的框架,从技术变革的角度来考察媒介的社会影响。

^① 参见[美]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维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加拿大学者哈罗德·伊尼斯是最早注意到媒介改变可能对社会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者之一。通过对人类文明史的考察,伊尼斯认为,书写文字的使用以及纸媒介的诞生为早期的埃及、希腊、罗马帝国的建立提供可能。在文字被大范围使用之前,政治统治主要依赖口语系统,因而政治权威比较分散;后来,随着新的书写材料——纸的发明和革新,文字的书写和携带变得越来越便捷,文字逐渐成为主要传播媒介,统治者借此能够方便地管理和控制广阔的区域,帝国的建立因此成为可能^①。换言之,帝国的扩张并不完全依赖军事,而更依赖于能将居于都城的统治者的命令传达至各地的传播媒介系统。由此,伊尼斯看到了媒介对社会文明的影响,“西方文明受到传播的深刻影响,传播的显著变化具有重大的涵义”^②。在伊尼斯看来,媒介的形态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都产生了深重的影响,“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③。例如,伊尼斯论述了纸的影响:“纸‘引起了极端重要的……一场革命’……纸‘使我们能够用一种普世的物质去代替昔日传递思想的昂贵材料,它促进了人类思想成果的传播’。”^④伊尼斯的观点实际上是对媒介本身作用力的一种探索,传播媒介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形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传播特点,从而对文化传播产生不同的影响,新媒介的诞生推动着社会文化的转变。

伊尼斯关于媒介的社会影响的观点吸引了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不同于从帝国文明角度出发的“传播偏向论”,麦克卢汉着重对媒介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将这种探索推向了更加纵深和广泛的领域,提出了“媒介即讯息”的大胆论断。麦克卢汉从人的感官经验出发,认为媒介技术实际上是人的感官延伸,故而媒介技术的革新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经验,改变了人们的互动关系,“任何媒介或技术的‘讯息’,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⑤。这种改变进一步导致了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等方面的变革。传播技术的演进在新的社会秩序和新的文化形式的出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铁路的作用,并不是把运动、运输、轮子或道路引入人类社会,而是加速并扩大人们过去的

① 参见[美]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曹书乐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三版,第295页。

② [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③ [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④ [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⑤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功能,创造新型的城市、新型的工作和新型的闲暇。……这样的变化与铁路媒介所运输的货物或内容是毫无关系的”^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媒介技术革新所带来的影响比媒介所传达的内容更加重要。

麦克卢汉的论述将媒介技术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更深层次地引发了人们对于媒介技术、社会、文化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之后又有诸多学者沿着媒介技术的研究之路,围绕着技术与社会文化持续探索,知名的有尼尔·波兹曼(著有《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詹姆斯·W.凯瑞(著有《作为文化的传播》)、约书亚·梅洛维茨(著有《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等。

尼尔·波兹曼同样看到了媒介技术的进步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巨大改变,在他看来,媒介就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②。不过,不同于伊尼斯的中立和麦克卢汉的褒扬,波兹曼对媒介技术采取的是批判式的态度,这让他的观点多了一种人性的关怀和反思的色彩。《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是波兹曼最知名的代表作,也凝聚了他核心的观点。在《娱乐至死》中,波兹曼全面反思了20世纪后半叶媒介变革给美国文化带来的消极变化:伴随着印刷时代的没落和电视时代的崛起,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一切文化内容包括政治、宗教、娱乐等等都成为娱乐的附庸。同样的,在《童年的消逝》中,波兹曼提出了一个颇具独创性又十分有说服力的论题,在电视之类的新媒体的猛烈攻势下,原本由印刷媒体在儿童与成人之间施加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在人类传播方式变迁的影响下,童年最终走向了消逝。无论是赞扬还是批判,波兹曼的基本出发点与麦克卢汉是一致的,他们都强调了现代社会中媒介技术的重要性。

詹姆斯·W.凯瑞将技术与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媒介技术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虽然他也是以媒介技术为文本,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意义,但是他没有将技术与内容割裂开来,而是将媒介技术放进实实在在的历史文化的经验和实践中进行多方位的阐释。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凯瑞详细论述了电报的个案。电报这项新媒介技术的发明,“第一次使传播从运输(transportation)中有效分离出来”^③。电报改变了书面语言的性质,改变了文学风格,对新闻业产生了重大影响;电

①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

② [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吴燕荃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③ [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报在空间上使市场达到平衡,将商品交易从地点之间的交易转变为时间之间的交易等等^①。在凯瑞看来,媒介技术尽管可以产生非同寻常的“讯息”,可是这些结果并非与世隔绝,而是与社会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技术的诞生是文化的产物,同时也会导致文化的改变。

约书亚·梅洛维茨的观点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埃尔温·戈夫曼理论和麦克卢汉理论的一种融合,他认为电子媒介影响社会行为的原理并不是感官平衡,而是“我们表演的社会舞台的重新组合,以及所带来的我们对‘恰当行为’认识的变化”^②。文字和印刷材料的传播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场景区分,基于“人们阅读能力及文化素养的差异”^③,不同的社会群体具有不同的社会身份,分属不同的社会场景。而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使许多社会言论重新分类……使得曾为各不相同的社会场景相互交叉”^④,人们的社会角色由此发生变化,行为方式也受到影响。

伴随着各种媒介技术的纷至沓来、不断革新,学界对媒介技术的重视程度愈加提高,收获了意义重大的研究成果,伊尼斯、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学者甚至形成了一股新的学术传统——媒介环境学派,对媒介技术的研究也在向更深更广更多元的视角迈进。

第二节 媒介技术的演进对文化传播的塑造

从媒介的历史分期来看,人类的文化传播曾经有过一段漫长的“前技术”时代,单纯的口语和文字是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到了近现代,伴随着西方印刷术以及各式电子媒介技术的诞生,媒介的发展自此离不开科学技术,技术成为产生媒介生态

① 参见[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168、173页。

② [美]约书亚·梅洛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③ [美]约书亚·梅洛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④ [美]约书亚·梅洛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的重要因素。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带动传播方式手段的创新,为近代文化传播提供了崭新而多样的可能性。传播途径的扩大增加了传播的范围,技术变革支撑和影响了文化与艺术的发展。在文化传播领域,媒介技术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技术与文化之间的互动也愈加密切。

媒介技术的演进赋予原有的文化传播以崭新形态,定义着近现代的文化传播生态。文化只有在传播中才能保持生命力,而媒介承载着文化的传播,近现代的文化传播与媒介技术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欧洲工业革命催生大众传播媒介,不同的媒介形态具备不同的传播特点,从印刷、电报的文字传播到电话、唱片、广播的声音传播和摄影的图像传播,再到电影、电视的影像视听传播,媒介技术的每一次突破性进展,都促进了文化传播方式与途径的快速变化,包括传播形式的多样化、传播范围的扩大化等,进而牵引着文化传播生态发生巨大改变。例如,曾经的通信仰赖于快马或信鸽,而电报的诞生实现了文字信息的即时传达,电话的诞生则更进一步地让声音的实时互传成为可能,如今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使得影像的同步也变成了现实。面对媒介技术带来的巨变,人们的心理经历了复杂的转变过程,从最初的震惊乃至排斥直到后来的习以为常,最终媒介技术的变革融入了社会文化之中,变成日常生活中难以抗拒的一部分,构筑着人类的文化传播语境。

在改变文化传播生态的同时,媒介技术还直接影响了文化格局,衍生出一系列新的文化形式,对原有的文化造成巨大冲击,甚至取而代之。流行于当今社会的大众文化和草根文化的兴起离不开媒介技术的进步。西方印刷术等复制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把以往只能被少数人阅读观赏的文化作品送入平民之家,传统的精英文化被拉下神坛,通俗易懂的大众文化蓬勃兴起、广泛传播;现代网络传播技术的普及,打破了原本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话语垄断权,伴随着权力的分散向下,草根文化悄然萌芽、蔚然成风。除此之外,读图时代对文字时代的替代,也是媒介技术进步的产物。铺天盖地的图像广告、充斥纸媒的图片信息、淹没视线的电视电影、纵横网络的影像资料等现象表示,现代社会已然是一个被视觉文化包裹的图像社会,“我们现在的文化运作方式与文化生活形态主要是由图像的呈示与观看来构成”^①。传播影像的媒介——电视牢牢占据着人们生活的重要地位,我们也难以想象如果点开互联网看不到绚丽的图片和影像信息,并且往往有插图的书籍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会更

^① 彭亚非:《图像社会与文学的未来》,载《文学评论》,2003(5)。



大……诸如此类的日常生活景象表明，视觉文化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伴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图像的形式内容变得愈加丰富，动态影像的制作和传播、静态图片的绘制与复制也都变得更加简便，视觉文化便以更加难以抵挡的气势在现代社会扩张，渗透至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现代社会的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视觉文化的蔓延，造成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对文字生存空间的挤压，是对以阅读文字为基本形式的传统印刷文化的一种取代。

值得注意的是，媒介技术的革新并不完全是新旧技术替代的关系，更多时候表现为新旧技术共生的状态。在技术发展的长河里，确实有媒介形态已然消失，如电报、唱片和留声机，但在更多的情况中，文化传播生态中呈现出的是多种媒介技术共存的复杂局面，新媒介技术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原有媒介技术的彻底消亡，“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文字的内容是言语，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①。例如，曾经以文字为载体创作的文化作品，在媒介技术的引领下，能够形成广播、音乐、电影、电视等多种方式的立体传播。因而，令人眼花缭乱的媒介技术建构的是一个多种媒介技术相互共生的纷繁复杂的文化传播生态。

第三节 中国近现代文化传播形态中的媒介技术演进

跨越了1840年鸦片战争后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百年近现代史，在中国悠长的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百余年里，中国大地经历的是一部屈辱的血泪史和不屈不挠的抗争史，更是一部风云变幻、跌宕起伏的变革史，这段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种种变革让中国的近现代成为承前启后的关键性时期。近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和传播媒介都处在剧烈变迁之中，媒介技术快速革新，文化传播方式与途径的演变速度大大加快，文化与

^①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技术之间的互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在近现代文化传播的变革历程中,媒介技术的演进展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

一、被动性与主动性的共同推进

纵观中国的百年近代史,不难看出,中国近现代媒介技术的演进离不开西方先进技术的传入。媒介技术的舶来品性质,使得媒介技术在中国的演进染上了一层被动性与主动性矛盾拉锯的微妙色彩:一方面,西方人在中国传播新技术,安装新技术设备设施,发展新技术事业,国人是在被动中不得不接受外来技术在中国的传入和推广;另一方面,部分具有开明意识的国人主动去学习外来技术,政府也表现出一定的主动意识,针对新技术开展自办的相关事业。在这种被动性与主动性的共同推进中,先进媒介技术在近代中国逐步发展起来。

工业革命完成之后,西方世界的科学技术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与此同时,欧洲强国不断扩大在地球上探索的速度和范围,当时正处于清王朝闭关锁国政策统治下的中国未能幸免。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被迫发生了改变。国门大开,西方的思想文化和先进技术进入中国,机械印刷术、电报、电话、广播等近代媒介技术纷纷涌入,在中国大地生根。西方印刷术的传入中国与西方传教士的推动密不可分。16世纪末,耶稣会澳门区主教范利安带来用活字印刷机印制的《日本派赴罗马之使节》一书,这是中国史上用欧洲铅活字印刷的第一部书。之后,意大利的马国贤以及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分别在康熙和乾隆年间在宫廷用西方的铜雕版进行了印刷尝试。不过,早期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比较少,他们的这些作为影响范围也都比较小。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通商口岸打开,西方传教士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纷纷开办使用新式技术设备的出版机构,据不完全统计,在19世纪的百余年间,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印刷机构超过60所^①。这些出版机构大多拥有宏大的规模、先进的技术和精良的设备,如墨海书馆等,虽然是为西方的文化侵略所服务的,但是客观上在中国传播推广了西方先进印刷术,还不自觉地为中国培养了一些掌握先进技术的出版人才。可以说,西方先进技术的传入与西方侵略者的铁蹄相伴相生,是西方世界强加于中国的结果,国人不得不被迫接受,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媒介技术的进步。

^① 参见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简明中华印刷通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页。



不过,在被动接受的同时,内忧外患的国情让部分国人意识到主动改变的重要性。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加之一次次的战败,救亡图存的思想逐渐萌生、愈演愈烈,中国社会开始产生一种向西方学习的“救国图强”的强烈愿望。1842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目的在于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使中国强盛。在经历了鸦片战争的沉痛惨败之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政府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以学习西方技术为手段、以实现国家富强为宗旨的洋务运动。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主要用于仿制西式武器;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局,制造枪炮弹药和机器轮船等;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同时建立了铁厂和学堂,还聘用了外国人担任技师;1889年,张之洞创办了汉阳铁厂,主要用于炼钢。虽然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但洋务运动为国人引进了科学技术的火种,彰显了国人对西方技术的主动学习之态度。除此之外,中国近代史上还有几次轰轰烈烈的主动学习西方的运动,例如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和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在持续了103天的“百日维新”中,可以看到丰富的变法举措:经济上,提倡实业、修筑铁路、组织商会等;政治上,广开言路、改订律例、裁撤冗员、编练新军等;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设立中小学堂、创办京师学堂、选派留学生等等。虽然最后维新运动还是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但它作为近代中国的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也是国人主动接受和学习西方新技术的一种体现。随着救亡图存的愿望愈加迫切,国人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渴求也愈发强烈。从一些西方先进技术在中国的推广历程中也能看出,除了西方势力的推动,国人自身的清醒主动也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国人对西方印刷术的态度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学习。近现代的国人学习西方印刷术的途径主要有三种:聘请外国技师、出国学习和引进设备。许多民营出版机构都选择了聘请国外专业技术人员的方法,如商务印书馆自成立之初就聘请了日本技师。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选派了第一批留学生,近代中国留学风气的序幕由此开启,此后不断有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很多人留学归来后参与到出版实践中,为西方印刷工艺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不少出版机构采用了直接引进西方先进印刷设备的方式,如上海申报馆1872年引进了手摇轮转印刷机,每小时可印几百份报纸,1912年又购置了双轮转机,每小时可印2000张。在整个中国近代史洪流中,经历了最初的阵痛和抵制之后,国人始终没有放弃对西方先进技术的学习,始终在不断努力跟进世界先进技术革新的步伐,推动西方媒介技术在中国的



传播推广。

二、感官延伸：传播功能的扩展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人的延伸”这一观点道出了媒介对于人的意义，某种层面上，也指出了媒介的本质。传播是文化存在的基础，而人是传播的主体。在人类社会诞生之初，文化传播的媒介是人本身，口语和身体语言是最原始的传播手段；当文字被创造之后，人类有了可以将口语延伸外化并记录流传的抽象符号媒介，文字的手抄刻写曾经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从文字的诞生开始，人类的文化传播媒介就已经开始逐渐从人本身的传播器向外延伸了，而印刷术的发明让人类渐渐免于手抄传播之苦，成为人类书写之手的有力延伸。媒介是人体的传播功能的扩展，以弥补人感官的不足，而媒介技术的不断革新则使这种扩展得到强化与加深。

18世纪中后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西方社会拉开帷幕，此时的西方社会已经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世纪中期，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传播技术领域里发生了一系列媒介技术的变革，机械印刷机的改进以及电报、电话、广播等技术的发明与发展，让文化传播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变迁。然而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其文化传播一直沿着自己固有的传统轨迹缓慢发展着，媒介技术的演进速度也比较慢，发明于中国的活字印刷术迟迟无法更进一步，也谈不上电子化、机械化的传播技术，清朝中后期开始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更是将西方轰轰烈烈的技术变迁隔绝门外。鸦片战争后，国门大开，西方先进技术潮涌进来，自西方印刷术的输入伊始，近代中国的媒介技术呈现出复杂多变的革新历程，标志性的技术手段包括电报、电话、唱片、广播、摄影、电影和电视等。来自西方的技术携带着与传统的传播手段迥然不同的全新气息，使我国媒介的传播功能得以扩展。在新媒介技术与人的传播功能的延伸融合之中，中国文化体系也随之发生剧烈变迁。比如，晚清时期，西方的机械印刷技术不断输入中国，逐渐取代了中国传统的手工印刷技术，一方面刺激了民族印刷业的崛起，另一方面改变了中国印刷出版物以文字书籍为主体的格局，形成了图书、报纸和期刊的三足鼎立，多种印刷媒介并存的传播格局，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政治文化体制的变革，同时也对大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又如，电报技术在中国的应用，突破了传统的邮驿传递制度，改变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促使报纸由政论向新闻的转型，催生了新闻通讯社，还带来新闻体裁、排版和写作方式等方面的变化，同时也对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再如,广播的兴起,不仅变革了信息的传输方式,还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娱乐内容,收听广播节目是当时人们的主要娱乐手段之一,同时广播还成为传播科学知识的载体,为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路径。无论是印刷业的发展,还是传播格局的改变,抑或是新闻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又或者是娱乐手段的丰富,近现代中国文化传播生态中出现的这些新型态势,都是媒介技术建构的结果。

三、深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作用

文化传播与媒介技术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媒介技术对文化传播生态的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媒介技术的演进历程也被社会文化的反作用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没有技术能够脱离社会文化而凭空诞生;缺少社会文化需求的刺激,技术的进步将是无米之炊。纵观近代中国媒介技术的演变进程,不难发现社会文化的转变在其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社会文化风气的变化影响着媒介技术在中国普及的进程。媒介技术在近代中国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尤其在风气未开的清末,媒介技术的普及曾受到来自官方乃至民间的多重阻力。例如,西方印刷术在传入中国时曾倍受阻隔。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中只有少数人能接受教育、阅读书籍,因此对印刷传播并没有太大的需求,传统的雕版印刷再加上手抄已能基本满足当时人们的需求,从而逐渐形成较为稳定的以官刻、家刻和坊刻为主的印刷格局,西方机械印刷术的市场需求相对较小;另一方面,清朝末期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拒绝西方文化的进入,形成了西方印刷术进入中国的壁垒。又如,电话的普及在中国曾受到阻隔,有些地方官员在上任之后强行拆除原已安装好的电话,有些地方的民众认为电话没有存在的必要,甚至认为电杆的架设影响道路交通,破坏“风水”,联名请求拆卸电话。可见,封闭落后的社会文化会阻碍媒介技术的普及。

中国大地幅员辽阔,在沿海和内陆等不同地区,其社会文化风气不同,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程度不同,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也有所差异,因此媒介技术的推进情况也各有差异。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沿海港口最先被迫开放,沿海的社会文化风气整体上来说比内陆更为开放,因此外来的媒介新技术往往最先落户于上海等沿海地区,在沿海地区的推广也更加容易。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进入中国,最先是在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洋行里出售;中国的照相馆相继出现于19世纪50年代的沿海大城市;电影技术于1896年进入中国,也是最先出现在上海。



整体上来说,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是向着一种更加具有近代化色彩、更加开放的新生态转变的,相应的,这种新型的文化传播生态促使国人对先进技术的态度从畏惧和排斥向接纳和学习转变,从而助推媒介技术在近代中国的不断革新。动荡不安的近代中国曾发生过几次重要的变革性社会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科学民主的风气得到开化,一定程度上使得新媒介技术的普及之路变得更加顺畅。“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猛烈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新文化运动,对科学的大力推崇、文化氛围上的开放性转变,为媒介技术在近代中国的流传提供了良性土壤。

总之,传播技术传入近现代中国并得以应用,可谓路途艰难,而从一开始现代媒介技术就显现了它强劲的生命力,与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现代媒介,最终对中国近现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军事等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回望历史,中国近现代的媒介技术引进与发展几乎与西方国家同步,与世界媒介发展史相呼应,中国近现代媒介技术传播史也成为世界媒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